



言思录

第一期
2012年12月15日

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会博士沙龙部、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筹)博士沙龙工作坊 投稿邮箱:sisusaloon@163.com

我们的强大
与渺小 1版

现代汉语语法
研究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 2-4版

研究选题
与国家战略:
以二十国集团(G20)
研究为例 5版

探究
“个人化写作”
推动文化史传播

由“天人之际”
看“满招损,
谦受益”的释译 6版

一场穿越时空
的文化之旅 7版



上外博士沙龙
主讲人推荐
书目选摘

上外博士沙龙
主讲人
最新学术成果
目录选摘 8版

顾问:汪小玲、韩殿秀
本期特约顾问:宋炳辉
指导:杨雪莲、夏卡莉、丁娟、
张艳、盛攀峰
策划:闵捷
主编:徐谔律
编辑:蔡书红、陈晓、李一帆、
臧金鸾、朱硕、朱林、
徐明明、闵捷、蔡艳姣、
张聪
视觉:刘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邮编:200083

我们的强大与渺小

汪小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
教授 主任、博士生导师

研思精微,博通多识。这是一本校园学习、生活、思考的记录,关乎你我,出版在每一位参与者和即将参与者的内心。

身处校园如同在洁净的沙滩上漫步,每个人每一段的感受不尽相同:可以很开阔很坚强,也可以很局限很脆弱。在注重个性又强调团队还免不了激烈竞争的今天,即便是这样理想的环境中,每个人也时刻都在审视着自己的强大与渺小,充

满了疑惑与不安。于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人群中,尤其是学习环境相似,认知道路趋同,彼此都能听得懂谈得来的一群人中,细细品味和思考。结果发现,自己的这点强大与渺小其实都算不得什么。沉浸在开阔的思路里,我们感受的是身心的愉悦,两种交替而生的快乐:一种是沉甸甸的厚重和实力,事关功利也事关心灵——学业进展如何,经验教训怎样,论文撰写心得,资料积累途径,事事切身体己,都能分享与分担;一种是轻歌曼舞的滋润,充满了自由的抒发和个性的写意,大到纵横天下事,小到得失寸心知。只要一杯清水在手,就都能够接受和欣赏,

充满激情与创意。

这就是我们的博士沙龙和这本带着心香的《言思录》,一块校园里的精神天地。她让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和学者自然聚拢,探索学习的深度与广度,伸展思考的空间和潜力。经过三年七十多场讲座和论坛,其中不乏白发尊者的棒喝,青年才俊的风雅,师兄学长的体验,懵懂新生的惶恐,大家经历着古今的浇灌,学科专业的交叉,学术趣味的互动,以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为基础,把政治学、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经济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引入进来,推向纵深,成就新时期多科性

外国语大学的学术特色与风范。这不仅是学校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战略的需要,也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需求:一个心智成熟的研究生需要认识到价值的多元,成功的维度和学业的永无止境。

所以,无论你是否还在为自己的强大和渺小而纠结,有点时间就请到我们常青的校园。一卷在手,在洁净明亮的教室里小坐,聆听长者的传授教诲,感受同学间朴素的情感交流和思想火花,在沙龙里拾萃,在翰墨中闻香,在见贤思齐的古训里体验读书的趣味和精彩。研精思远,究微践行。何乐而不为?

嘉宾寄语

- 享受学术交流的自由,体验思想交汇的快乐。——陈靓老师(2011年3月8日第31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 播种学问,收获快乐。——黄碧蓉教授(2011年11月29日第56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 祝愿上外博士沙龙成为上外一块常青的学术绿洲! ——谢天振教授(2012年3月6日第62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 风物常宜放眼量。——申圆博士
- 静心,潜心,专心。——王圆圆老师(2012年10月23日第78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 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语言的艺术一定会使这门艺术更加艺术。——冯庆华教授(2012年10月30日第79期博士沙龙主讲嘉宾)

起源于一个想法

开始于一种信念

发展于一种坚持

致力于一种精神

给学术以尊严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陆俭明
教授
北京大学

我是一个愿意研究的人,也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能够让大家看到,只是如此而已,我今天就讲讲今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发展的趋势。

那么当今对语言的一种新的认识呢,应该说,我自己觉得,就从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整个语言学领域发生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可喜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哪呢,它就源于我们对语言的新的认识。那么首先是对语言的本体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这种对语言的本体性质的新的认识,我觉得,它是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革命,恐怕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个名称,那么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怎么理解乔姆斯基革命,你们哪一位自告奋勇说一下,乔姆斯基革命意味着什么。

学生1:乔姆斯基对语言的认识,他就一反原来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描写,然后他开始探讨人类是不是有一种更深层的语法结构,存在于人的心智中,他想描写存在于人心中一种普遍的语法,他就使用了一套逻辑学,数学等方法,来阐述语言,乔姆斯基使人们从描写主义跳出来,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语言,引发了一场语言学的革命。

陆老师:乔姆斯基革命,确实可以像他所讲的,改变了语言研究的航向,那就是改变单纯的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描写的这样一种语言研究的思路,具体的就体现在乔姆斯基的三大假设上。一个是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一个语言装置,这是他不同意结构主义的首要一个地方,结构主义认为,人生下来,脑袋是一块白板,那么由于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不断跟他说话,刺激反应,刺激反应,那么这一块白板上有了语言,孩子能够说话。他说不是,他说人生下来就有一个语言装置,这个是人经过千百年来遗传所形成的,这是一个假设。第二假设就是人的语言千差万别,但是都遵循共同的组合原则,差异只是一个参数的差异,这就是他很有名的原则和参数理论。第三个,他认为人类语言共同遵循的组合原则,应该是非常简练的,因为他,像刚才那位同学所讲的,他本身是从结构主义中出来的,他是海瑞斯的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希伯来语的,发现从语言,到语义,到句法,这个规律是千百遍的,他就想儿童怎么能记住那么多成千上万条规则,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就是从这地方开始的,乔姆斯基的观念,具体体现在他这三个假设当中,而且具体体现在,为了证实他的三个假设,他所不断的探索。那么随着乔姆斯基革命,以及随后出现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那么人们对语言有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认识,那么,我们过去对语言怎么认识的呢,恐怕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过去认为,语言是什么,是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个看法没有什么不对,但现在看来,不全面,现在看来,首先应该把语言看作是入脑先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刚才讲了,它是一个装置,说人生下来就具备的一个装置,因此,语言呢,因为人的遗传,而



图为第57期博士沙龙现场,陆俭明教授为上外师生作精彩演讲。

生来具有的一个信息表达的接收系统,这个信息表达的接收系统它的重要性就类似于我们人所具有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那样重要。人没有呼吸系统,没有消化系统都不行,那么没有一个信息表达接收系统也就不能成为人,那么根据上面这个认识,那么语言,他认为应该分为内在语言和外在语言,那么正是在乔姆斯基革命的这种影响下,正是由于人类本体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语言学学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个变化突出的一点是彻底改变了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彻底改变了对语言结构描写的单一的思路,从而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在语言研究领域,出现了形式、功能、认知,三足鼎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新的局面,另外一个,出现了重考察、重描写、重解释,进行多层次、多视角、多方位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那么上面所讲的这个两点,分别就显示在形式语言学派、功能语言学派、认知语言学派他们的要义之中,现在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因为,这些恐怕大家都已经成为常识,形式语言学派,大家都知道,以乔姆斯基为代表,他强调语法的天赋性、自主性,着重探索人类语言的机制,着重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这是他最重要的两个探索的方面,特别是探索在以下三个方面共同遵守的原则,他认为在这些方面,人类语言应该遵循共同的原则,一个就是句法运算系统,比如说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不管你是用什么语言,你要来表达一个意思,怎么办呢?乔姆斯基假设已经存在一个词库,那么我们要表达一个意思,就从这个词库里去取出在每个词项上多已经具有鲜明的特征,这样的词项把它调出来,调出来以后进行组合,调整,形成一个可以描写的结构,他讲的可以描写的结构也叫 construction,它不是 constructure,这样一个点,那么有了

这个可以描写的结构以后呢,它就分别要和语言学接口、音韵接口,还要跟逻辑语义要去接口,这样才能出来我们所能听见的一个句子,因为他要探索的这个共同遵守的原则,他认为,在句法运算系统上,这个原则在所有的语言上都应该是共同的,所形成的可以描写的这个结构在跟音韵接口上应该具有共同的位置,还有一个,再跟句法逻辑意义上接口,应该有共同的位置。同时,他就探究各个语言的参数差异,也就是说,在探索人类语言共性的基础上,探索各个语言的特点。乔姆斯基是一个,可以从学风上来讲,开创了一个自由谈,各抒己见,这跟结构主义截然两样,结构主义是很霸道的,从布龙菲尔德一直到霍格特到海瑞斯,学生必须听老师的,乔姆斯基不是,乔姆斯基说我这个看法是假设,我可以假设,你也可以假设,这样的话大家无拘无束,他特别注意招收这些他不知道的学生的学生,你根据我的理论,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看看你的母语,希望你对我的理论提出挑战,因为他是欢迎学生对他挑战,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在探索共性的同时,探索各个语言的个性特点,这是形式派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功能语言学派,他们所说的功能就是指的语言的交际功能,这个大家都熟悉,语言的功能是什么,最大的功能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为他认为,语言的一个根本的功能就是交际,那么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既是我们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语法研究最后成果的归属,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来研究语法,就是要从交际这个角度去思考,你研究最后为什么要去研究呢,是为了更好地有利于我们人类交际,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功能学派所考虑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 How grammars can be the way

they are? 这个语法何意是如此呢,那么他的回答也是,他说这个是由语言的交际功能所决定的,因此在功能语言学派里面,几乎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用法先于语法,但语法哪来的,语法就是大家都这么用,用着用着大家都承认了,这个就成了语法。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在那说,很德国,很阳光,很男人,很农民,这是新兴的。语言总是在发展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出现变异,如果是一个守旧的规范者原理,那么语言出现的老是不规范的东西,不能接收的东西,但是语言毕竟是这个群体共同拥有的语言,因为大家都在用,用着用着大家都接受了,你就得承认。我常常说一句话,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他没有规定的权利,他只有解释的义务。规范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这个也是功能学派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于是,社会变异、语法化、话语篇章分析、语言类型及语义地图、对话交际和话语信息结构等等,这些都成为功能学派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认知语言学派,他的观点是,语言是人脑心智和人的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基本功能,他认为就是象征,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预言世界并不是直接对应于客观的物理世界,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是从他开始,以前早有人这样说了,但是,他对这个问题说的比较透,他认为,在这个中间,有一个主观的心理世界在作中介,这个中介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认知欲,头脑里面这个认知欲,因此,他认为,象征是语言结构被赋予内容的最基本的手段,各种语法结构的类型,都可以视为,不同象征所造成的不同的结构类型,并认为,都有理据型,可以验证,于是这些问题都是他感兴趣研究的,比如说,相似性、范畴化与非范畴化、意象和图示、主观性和客观化的问题、隐喻转喻的问题、有界无界的问题、共

识的问题、语言的“言、知、行”三域,等等,这些都是认知派所关心,所研究的课题。因此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特别是进入了21世纪,人们对语言,首先是对语言的本体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极大的推动了整个语言学科的新的认识,其次,是对语言功用有了新的认识,语言的功用,我们过去上课听到的三句话,“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是人类保持,传承人类科技文化和认识成果的载体”,我们在上《语言学概论》和《现代语言学》,讲到语言的功用就这三句,没错,是,但是现在对它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什么认识呢,20世纪以后,特别到了21世纪,对语言的功用,他们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不仅仅具有工具性,更具有资源性,还具有情感性。资源,我想李宇明先生可能来这里做过报告,给大家谈过这个问题,语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社会资源,并能够进一步开发衍生为财富,我要指出的是现代不少国家已经逐步提出了语言能力,甚至提出国家的语言能力、语言服务、语言管理、语言产业、语言职业、语言经济学,等等这些名称,而且语言跟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这个我也要提醒同学们,你们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对个人来说,语言已经成为与他人竞争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招聘人,首先考核你的不是你的专业知识如何,不管是理科、工科、文科,都一样,首先考核你的是你的语言能力,你的语言修养,一个是母语的修养,看你讲话是清清楚楚、言简意赅,还是颠三倒四、说不清楚,另外,给你一篇东西,请你用三百个字给我表达出来,那看你这个书面表达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个外语,首先考核你的就是这种素质,这种素质不合格,走吧,专业素质不考核你,这个考核通过了,再通知你,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专业我们这个需要来看你如何,因为,语言已经成为一种与他人竞争的一种重要的条件,这里我顺带:上海《解放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把语言修养分为三等,优秀、中间、一般,然后他调查不同等级的工资收入情况,优秀和一般的5:1,你一个大学出来,甚至一个硕士生,博士生出来,语言修养一般,我不说他差,我只说他一般,那你那个工资呀,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块钱,他语言修养好,外语,甚至能两门三门外语,他可能一出来就八九千,一万多工资。这是现实,不是哪个人在胡说八道。另外,语言也好,方言也好,都具有情感性,这个恐怕大家都会体会:一个上海人,跑到外地,碰到另外一个上海人,一讲上海话就热乎了;一个河南人,跑到上海来,碰到河南人,一讲话也热乎了,语言有情感性;我们跑到外国去,碰到中国人,一说中国话,这个就拉近了,他有情感性。因为,语言或者方言,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象征,语言方面的种种关系,语言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处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影响国家的发展,这一方面,既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历史教训,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英明,新加坡65年独立到80年代就能成

<<< 上接2版

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应该说他的英明的语言政策立了功,65年独立的时候,华人占了百分之八十,马来人只占到了百分之十四,印度族人只占到了百分之四点几,还有欧裔占百分之零点儿,就面临一个问题,以什么为国语,以什么为第一语言,所谓第一语言是什么意思,就是政治语言、外交语言、经济语言、教育语言,这个是所谓的第一语言,要以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话,当然是华语了,我们占了百分之八十,可是李光耀领导的当时的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这样一个政策,国语是马来语,第一语言是英语,同时实行双语政策,你是华人子弟,既要学英语,也要学华语,你是马来人,既要学英语,也要学马来语,你是印度人,既要学英语,也要学印度语。马来语为国语,什么意思,是指国歌是马来语,如此而已,那么他为什么要马来语为国语呢,不要华语为国语呢,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马来西亚多大,他要处理好和马来人的关系,他要处理不好,马来西亚说你还是回来吧,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他为什么要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因为他是一个城市国家,它要生存,它要发展,必须走向世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的飞机从樟宜国际机场一起飞就出了国了,除了空气和阳光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一起都要靠进口,你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行吗,这是成功。而失败的,反面的,那多了,巴基斯坦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吧,我们开奥运会的那一天,俄罗斯跟格鲁吉亚打起来了,是不是,导火线就是语言,背后当然有政治问题,乌克兰的语言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到底是以俄语为第一语言,还是以乌克兰语为第一语言,比利时的语言问题是比利时的总理总是短命的,几个月就要一换,这种事情多了,加拿大魁北克的问题,都是语言问题,那么对语言的新的认识,影响到我们汉语的语法研究,对汉语的语法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有两方面,我自己觉得有两方面:一个是影响汉语的本土研究,另外一个助推了汉语应用研究的发展。那么今天,我着重只谈对汉语的本土研究的影响,关于应用研究这一方面,我就不具体谈了。

我们知道以往的汉语语法研究应该是有成绩,但是有缺憾,缺憾在什么地方呢,研究的思路窄,理论思考很差,只描写,少解释,这是过去语法研究的缺憾,具体成绩我就不谈了,因为有好几本语法学史在那谈成绩,但是,说实在话,现在的语法学史,只是一个流水账,他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深刻的思考,那么我们现在一般都习惯于什么呢,句法上主谓宾,六大成分,主谓宾定状补,碰到一个句子,我们就考虑,那个是主语,那个是谓语,那是定状补。语义上呢,若是个动词,那么就考虑动词,动作,哪个是施事,哪个是受事,哪个是工具,习惯了这样一种思考。现在,跟这个情况,有所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自己觉得,一个是加强了理论思考,第二个是对各种语法现象,开始都要追究,追究什么,为什么,该怎么看,该怎么解释,这个可以说是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特别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这些方面发展的特别好,因此,应该说,对汉语的语法有这样新的认识,关于理论思考,恐怕大家都已经知道,理论思考,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摆脱受到印欧语束缚的

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熙在一次谈话里面提出来的,那么事实我们的汉语语法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因为他确实是在印母语体系的这样一个指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因母语的这种影响比较深,那么朱德熙先生提出来呢,就说要注意摆脱这样一种束缚;二是提出了怎么从人类语言共性的视角来认识语言,那么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洪君,在1994年,他这个文章,挺好,最近王洪君已经将他的论文整理成为一个集子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你们应该去看这篇文章,他里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我们总说,这是我们汉语的特点,可是你放到世界语言里面一看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强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我们如果不考虑语言的共性问题,继续考虑汉语的特点,那我们只能永远落后在西方语言的背后。大家都知道语言有四个传统,古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阿拉伯,四个传统,发展最好的就是古希腊这个传统,他们为什么发展很好,我们也发展很不错啊,后来形成的也不错啊,也很辉煌啊,但是你们看到没有,我们始终没有走出国门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能走出国门到全世界去呢?他们有一条很重要的,他们不是站在自己的语言看语言,他们去注意全世界各个语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我们老是站在自己的语言来看语言,这个就会有大的局限性,可是问题跟着来了,我们怎么摆脱,摆脱的切入点应该选择哪,怎么真正从世界语言的共性特点来认识汉语的特点呢。那么朱德熙先生,大家都听说,提出过词组本位的观点,那么他提出这个观点,正是他探索的成果,同意不同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他探索怎么摆脱印欧语束缚这方面的观点,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学校的徐通锵先生,已经过世了,那么他把切入点选在语法切入的位上,提出了字本位的观点,那么这个也是他要强力的摆脱印欧语的束缚所作的努力,同意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们知道邢福义先生把小句作为切入点,把小句作为中枢的一个语法规,那么我们最近也看到沈家煊先生就词类问题来使我们摆脱印欧语的束缚,他认为作为理论构建,汉英有系统的差异,讲汉语的语法不能够过分的重视名词和动词的差异,他认为汉语的词类不是名动形三足鼎立,那是什么呀,首先是状态词和名词不可分,名词里面包含有动词,动词只是名词里面的一个部分,形容词是动词里面的一个部分,因此,形动名是层层包含的关系,那么这个也是沈先生为了要摆脱印欧语束缚所提出的一种想法,那么我们也提出过小语法规,什么叫小语法规念呢,我认为现在语法书上所讲的语法实际上既包含了语法规则,也包含了语用规则,语法规则和语用规则还是两码事,但是在我们的语言里面,在汉语里面分不出来,在英语里面,它是分得出来的,比如说I'm reading this book,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本书"放在句子头上去,可以,怎么放法,两种:一种把它变成被动句,那么谓语中心就要得到改变,用verb to be加上过去分词,那么this book就成为全句的主语;还有一种办法就直接把它放在头上去,this book I'm reading,甚至后面可以来一个代词,this book I'm reading it,研究英语的人,说英语的

人,他们把前一种放在头上,认为这个是主语,对于第二个放在头上,没人认为这是主语,他认为宾语提到句子头上,作为一个topic,这是语用规则,前一种是句法规则。我们“苹果吃了”,“鸡不吃了”,你到底是句法的移位,还是语用的移位,我们说不清楚,因此我提出了我们汉语,我们要把握它的语法规则,不能在句子的层面,而是要在词组的层面,因此我把在词组层面把握的语法规则称之为小语法规,那么这个也是含有摆脱印欧语束缚的思考,在这个里面我不想对上面种种观点加以评述,那么我现在想说的是,恐怕我们要摆脱的不仅仅是摆脱语法单位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更新我们句法研究的思路问题,那就是要更新我们刚才说讲的,句法上老是主谓宾,语义上施动受,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分析思路我们要加以适当的变化,那么这种思路,大家都知道,是从古希腊传下来的,句法上主谓宾,语义上施动受,古希腊传下来的,比如说“张三喝咖啡”,怎么分析呢,张三是主语,喝是谓语,咖啡是宾语,到了结构主义层次分析,那么改为张三是主语,喝咖啡是谓语,谓语里面是述宾,结构主义只增加了层次性,从分析思路来说,没变,那么从语义来说呢,施动受,这种分析思路,应该是符合语言分析的,是科学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一直沿用到今天,我们现在还能用它,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无论我们今天形式派和功能派都接受这种分析思路,问题就在于语言是相当复杂呀,我们现在,前几年在石家庄开了一次会,叫语言学高级论坛,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现在对语言只是看到了它的冰山的一角,这些传统的分析方式和分析思路不能解读所有的语言现象,句法,传统的分析思路,对于比如说性状结构,什么叫性状结构,她很漂亮,这个就是性状结构,判断结构,我是教师,他是学生,这就是判断结构,可以用这种思路,但是很多语法并没有用这种思路去解读,我这只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存在句,存在句大家都很熟悉,“台上放着鲜花”,“台上坐着主席团”这都是存在句啊,很熟悉啊,你要去网络上一检索,网络上存在句的论文一百多篇,还有几本著作,研究最多的是南开大学的宋玉柱教授,很多。可是,对于存在句,语法学界都是这样分析,或者说是主谓宾,或者说是状谓宾,台上是状语,不管是状语还是主语,这个虽然有差别,但是基本的思路还是主谓宾定状补,语义上也是用施动受来分析,都是这样分析,可是现在我们要反思,要来反思,追究,反思什么问题:第一,这种句子表示的存在意是从哪来的,你怎么知道“台上坐着主席台”“台上放着鲜花”表示存在,这个存在的意义哪里来的;第二,主席团也好,孩子也好,病人也好,他们是坐站躺的施式,他怎么跑到动词后面去了,这都是一元动词,怎么跑到动词后面去了;第三,B组动词的“放、挂、贴”,二元动词,它的施事怎么不在动词里面出现;第四,人们常常说,一个述宾结构,如果的宾语的语义解释不一样,那么整个述宾结构或者动宾结构的语法意义就不一样,“吃苹果”是一个意思,“吃大碗”是另外一个意思,“吃食堂”“吃麦当劳”又是一个意思,“吃父母”又是一个意思,大家不会把“吃父母”和“吃苹果”平等看

待,因为语法意义是不一样的。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存在句,A组的宾语是施动者,B组的宾语是受事,但是他们的语法意义是一样的,都表示存在,表示静态,这为什么呀。再一个例子:“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我们都接受,都知道什么意思,而你去找一个外国留学生……这儿有个外国留学生,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学生2:不知道,但我不是一个外国留学生。

陆老师:哦,你不是留学生。

学生2:对,我不是的,但我看懂了。

陆老师:什么意思呀?

学生2:就是……一锅饭……不够吃。

陆老师:嗯,挺好。你们可以去问问留学生,“一锅饭”知道,“吃不了”知道,“十个人”也知道,但是“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他们就不一定知道什么意思。其实不光是知道什么意思,还要知道应该怎样去解读。传统语法句法上的主谓宾和语义上的施动受绝对解释不了这个例子。有的人用含宾述?解释,有的人用轻动词解释,但都不圆满。根本无法说明它的机制和动因。传统的句法分析机制是科学的,是符合语言事实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可以用这一方法分析,因为语言太复杂。那么存在句也好,上面举的这个例子也好,他们的动作性已经很弱了。虽然它们的核心好像还是动词,但已经不属于动作事件结构。这一点张旺熹在1999年已经看到了,但他没有指出一条出路,怎么去解读,他没有抓住。传统语法没办法解释这类句子的语法和这类句子的具体意思。看来我们不能囿于这种传统的句法分析思路,我们需要另外找出路。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思考,我们提出了“构式——语块”句法分析。那么这种句法分析的理论背景是什么,运用“构式——语块”具体怎样分析一个句子,明天我要在交通大学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说明。

这些是理论思考,我讲的变化之一就是加强了理论思考,这应算是汉语语法研究可喜的一个变化。另外,要注重追究为什么,我举一系列实例来说明问题。比如,“他是我的老师”,我们用传统语法分析这个句子是判断结构:“他”是主语,“是我的老师”是述宾。过去分析就到这里为止了,但现在要追究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可以说“他是我的老师”,而不说“他是我的教师”?而且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位汉语老师”,也可以说“这是一位汉语教师”,但就是不能说“他是我的教师”。可是为什么又能说“他是我的家庭教师”?我们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不能满足像过去一样一分析就完了。再一个问题,形容词修饰名词,这个问题恐怕大家都很熟悉了,但问题就出在了汉语中形容词修饰名词用“的”不用“的”?英语当中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汉语里面用“的”的现象并不对称,不是说用“的”的都可以不用“的”,反过来也是。我们来看例子,“冷的饭”可以说“冷饭”,“热馒头”可以说“热的馒头”,可是“热的肉”“冷的鱼”我们就不说“热肉”“冷鱼”,“大规模”我们不说“大的规模”。这个不用教,小孩子都会,可是就外国人就苦了,老是问我们到底用“的”不用“的”。而问题就在于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形容词修饰名词是这样,名词修饰名词是不是也是这样?现在就是要解释为什么,而且要扩大范围,名词修饰名词是不是也是这样?“她是我

的女朋友”和“她是我女朋友”有区别没有?所以现在要考虑这些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来说比较好,早在1956年朱德熙先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到1998年,过了半个世纪,才由张敏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还有汉语口语中常用的“A(一)点儿!”祈使句,比如“虚心点儿”“大方点儿”,还有比如我画了一幅画拿过来挂起来让大家看,你们会说“陆老师,右边高一点”“左边低一点儿”。这些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不用教的,但外国人惨了,他们就不知道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

袁毓林的解释是,用于这种结构的词要“可控”,而且要“非贬义”。为什么要“非贬义”呢?我们可以说“大方点儿”,但不会说“小气点儿”“小气点儿”,同样我们说“虚心点儿”,不说“骄傲点儿”。那为什么要“可控”呢?有的词褒义也不行,我们说“冷静点儿”,但我们不能说“哎,姑娘,美丽点儿,美丽点儿”,我们也不能说:“小王,伟大点儿,伟大点儿”。有人说了,这种用法是口语的,“美丽”“伟大”是书面语,所以当然不能这样说了。那好,我们来看,“大”“帅”是口语词吧,但我们也不说“小伙子,帅点儿,帅点儿”,还有“棒一点儿,你再棒一点儿”,也不说呀?因此,袁毓林提出可控,因为“伟大”“美丽”等等都是别人对他的一种评价。但是问题又来了,“马虎点儿”“糊涂点儿”,“马虎”“糊涂”都是贬义的呀,为什么能说?再比如,拍电影拍电视剧时,假如拍一个小偷的窝点,导演就对工作人员说了:“哪有这么整齐的呀,乱点儿,再乱点儿,再脏点儿”,这些也是能说的。有人说这是语用的问题,语用就成了一个垃圾桶,解释不了就往这个垃圾桶里扔。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到底为什么。好,下一个例子,我们只说“碗里两条鱼”“扔框里一个球”,而我们不说“扔碗里鱼”,这个数量不能丢掉,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我80年代提出的,就是数量结构、数量范畴对句子有制约作用。90年代沈家煊提出,这个解释还不够,他用“有界”“无界”来解释这个问题。具体的解释是“扔碗里鱼”是一个有界的动作,所谓“有界”就是有起点有终点,所以其后面的宾语也要有界,而单独一个光杆名词表示通名,表示一类,这是无界的。一点要是表示个体的名词才行,加上数量词就成为有界的了。这个解释比我的深刻多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追问,为什么动宾结构中动词是有界的必须要求宾语也是有界?沈先生没解释。我们要追究,这样才能把研究不断的引向深入。下一个例子,“那孩子追得老头儿直喘气”,这是语法上经常举的一个例子。过去就是进行层次分析,“那孩子”是主语,“追得老头儿直喘气”是谓语,“追得老头儿直喘气”也是述补结构,“老头儿直喘气”又是主谓结构作补语,就这样一层一层进行结构分析。于是这一句话有好几个意思,“孩子追老头儿,老头儿喘气”,或者“孩子追老头儿,孩子喘气”还有一种解释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老头儿追孩子,老头儿喘气”没有人同意的解释是“老头儿追孩子,孩子喘气”。过去就是这样一交代就完了。但是现在就要问了,为什么上面几种理解的可以接受,有的就不能接受?为什么?现在强调的就是解释,这样就使问题深入了。再比如说:“那件事激动地张三流出了眼泪”。用过去的层次

<<< 上接3版

分析分析这个句子很容易,这个句子含有致使的意义。但是现在要追究,致使的意义怎么来的。再有,“我送一本书给小李”“我送给小李一本书”,“给小李”可以放在句子最后,也可以放在“送”的后面。过去只是说这两个句子是不一样的:“我送一本书给小李”按照朱德熙的分析这是一个复位结构;“我送给小李一本书”这是一个双宾结构,其中的“送给”又是一个复位动词。过去的话就到此为止。但现在就要问了,“我送一本书给小李,小李不要”,这可以说,但是我们不能说“我送给小李一本书,小李不要”。另外,加“了”,“我送了一本书给小李”,这样可以说,但下面的说法不行:“我送了给小李一本书”。但如果加“给”后面加“了”,第二句能加,第一句不能加。诸如此类,现在都要追问为什么,怎么解释。好,再来看,“眼镜在剪刀右边”可以,我们也可以说“剪刀在眼镜左边”,可是“小岛在湖的中央”,我们从来不说“湖在小岛的周围”,这是为什么?“书在桌子上”,我们不说“桌子在书下”;“蚊子在钉子旁边”,我们不说“钉子在蚊子旁边”。过去这些现象都没有得到注意,现在都注意到了,而且要对它们进行解释。再看两组句子,它们的格式是相同的,A组:“不相信他不知道”就是“相信他知道”;“不赞成他不回国”就是“赞成他回国”;“不希望他不参加”就是“希望他参加”。但是B组的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不怕他不来”的意思不是“怕他来”。A组B组的意思为什么不一样?好,汉语介词“给”可以表示多种语法意义,而在各方言里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又不同。过去延边大学的崔承一老师专门写了一本书分析“给”。过去说实在不知道怎么去研究这一问题,现在要去啃这个硬骨头,怎么去啃?就从语义类型和语义地图这个角度去啃。再看:“王平能说日语”,这个“能”表示一种能力;“这我能骗你吗”,这个“能”表示一种可能;“你能告诉我吗”,这个“能”相当于“肯”。这三个“能”在三句话里表示三个不同的意思。过去就交代一下三种意思就完了,现在不行,现在要追究为什么同一个“能”在三个句子中表示三种不同的意思。另外,看三句话:“张三回来了,因为他还爱着小丽”;“张三还爱着小丽,因为他回来了”;“张三还回来吗?因为小丽在等他”。这三句话情况不一样的,比如给第一句话加上一个“是”,变成“张三回来了,是因为他还爱着小丽”;第二句话能不能加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张三还爱着小丽,是因为他回来了”,有的人认为可以,有的人认为不行;第三句就绝对不能加,“张三还回来吗?是因为小丽在等他”绝对不行。现在都要追究为什么,这个情况怎么解释。还有,“——你喝了什么?——我喝了咖啡”,这个回答可以,但答语不能说“*咖啡我喝了”。反过来,我泡了一杯咖啡,回来发现没有了,我就问“咖啡呢?”别人回答说“咖啡我喝了”,但不会回答说“*我喝了咖啡”。为什么?还有,以下这些句子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使得教员和学生都产生了极大的挫败感,比如说“把”字句和“被”字句,“弟弟打破了我的杯子”“弟弟把我的杯子打破了”“我的杯子弟弟打破了”“我的杯子被弟弟打破了”,这些句子的核心意义都是一样的:我的被子破了;谁打破的?我弟弟。可是,不同的句子格式,表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但现在就要追问,它们的不同到底在哪里。第十八的例



图为第57期博士沙龙现场,陆俭明教授与上外研究生互动。

子,汉语的介词“和”与英语前置词with的异同问题。有些人一比较就发现一些东西来。汉语的“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介词,引出伴随者;还有一个是连词,表示并列。而英语的with永远是前置词,没有成为连词。换句话说,英语里没有一个表示with的连词。但是,英语的前置词with和汉语的介词“和”不一样:汉语的“和”只能引出伴随者;英语的with可以引出伴随者,而且还可以引出工具。比如:I open this door with this key.(我用这把钥匙开的门。)。with可以引出方式,还可以引出原因。换句话说,英语里面的with的意义比汉语里面的前置词“和”要丰富的多。为什么?什么原因?单就这两个语言之间没有可比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许多种语言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发现,原来英语和汉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类型。我们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和非洲的一些语言一样,都既有一个介词引出伴随者,又有一个同形的连词引出并列关系;可是另外一些语言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印欧的一些语言,非洲的另外的一些语言,以及南美洲的一些语言,比如一些土著语,这些和英语一样,只有前置词,但前置词除了可以引出伴随者以外,还可以引出原因、方式等等。这种不同偶然吗?不是。再一研究发现,这跟位置不同:我们的“和”,是放在主语和主要动词之间,比如“我和张三下棋呢”,“张三”就放在中间;可是英语的前置词结构with是放在句子的末尾。正是这种词序上的差别,造成了这两个词的发展方向不完全一样。我们知道词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的,尤其是常用的词,总是要变化的。但是由于词序(word order)的不同,造成了一些语言比如汉语的前置词是放在主语和主要动词之间的,又发展成并列连词,但是前置词很单一。如果这个前置词结构放在末尾,它就像英语那样发展,不会发展出并列连词,但是前置词的意义会变得多样。这就是一种跨语言的研究。显然,现在这样的研究,这样的思考,比先前只是简单的描写要深入得多了。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到当今中国汉语研究的现状。这个现状是什么呢?简单的概括一下,不一定准确,那就是既重视概括和描写,更重视探究其所以

然。重视解释,而且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多元化,探究的视角多方位。这也可以说是当今汉语研究的一个新的特色。而且这个状况告诉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你们将来走上语言研究的道路,也是要往这个方向走。什么方向呢?那就是既要重视考察描写具体的语言事实,又要注重探究所以然,注重解释。在理论方法上,一定要多元化,多元这一条非常重要。当然,每个人的爱好,每个人的倾向性,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比如有的人对形式语法感兴趣,有的人对功能语法感兴趣,或者有的人对认知语法感兴趣,这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比如如果你从事形式语法的研究,你不能排斥功能和认知的理论方法,而且要学习、了解和吸收他们合理的东西,为你的形式研究服务。从事其他两种研究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要多元论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千世界复杂多变,所以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方法,任何一种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内的一定问题,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内的一定现象。超出了这个范围,可能就无能为力。这个不是语言学界是这样,任何学科都是如此。因此理论方法的发展常常是不断出新,但是大家注意,出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不意味着要代替旧的东西。新的理论方法和旧的会形成一种互补。比如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进行思考,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但是后来发现有的问题他解释不了,比如光的问题力学就解释不了。这样就出来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出来了量子力学。后来知道了牛顿的力学定律只能解决宏观低速的力学问题。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高速运动问题,他无能为力。但是相对论是不是到了顶了?也不是。现在相对论也碰到了像黑洞这样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理论方法的发展总是这样: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现有的理论对先前提出的问题解释的还可以;但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就招架不了了,那就要寻求新的途径。但这里面要记住,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要发展,老的也不要扔掉,还有用。比如过去游泳怎么游,就是狗刨,就过去了。非洲的野生动物迁徙的时候就是那样过河的,有的

就死在河里了。可是,人聪明,看到树倒了以后会浮在水面上,于是就用树桩过河。可是遇到再宽一些的和怎么办呢,于是就想了木排、帆船等,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万吨级的大轮船。这就是发展,不是简单地代替。因为比如在黄河激流里面,你再好的大轮船用不上,还得用木排竹排;你在沙家浜芦苇荡里面,还得用小木船。我们的理论也是这样,我们最早使用的是句子成分分析法,那你不要认为这个就过时了,就没用了,因为这在基础教育中还是必要的,句子成分可以帮助孩子们把一个很长的句子的主干很快地就抓住了。

那么今后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势,我自己的感觉是越来越关注语义的问题。因为现在认识到,保守一点说,句法的问题说到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语义的问题,可能以后会证明出根本上就是个语义问题。那么关于句法语义问题这些年来很多人在思考,我这些年也一直在思考,经过思考我提出了三种看法,也可以说三个收获。收获之一,发现并明确提出了“词语间语义关系多重性”理论。词和词之间可以形成不同的句法关系,这个早就谈了,比如“咬死了人的狗”既可以是动宾,也可以是偏正。甚至“出租汽车”既可以是动宾,也可以使偏正。这种现象早就观察到了。再比如“母亲的回忆”,到底什么意思?是母亲回忆她年轻时时候的事情呢?还是某个人回忆她母亲呢?这个就是说明“母亲”和“回忆”之间是施动关系还是受动关系。但是从理论上提出相同的词语之间就是存在语义关系的多重性,没有。我认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如我们之间是师生关系,因为我教过你,你听过我的课,这个到哪儿你都叫我老师;可是假如将来某个学生当了医生,成了主治医师,我呢,越来越老,老了就会住院,正好住在那个学生所在的医院,正好那一天他来查病房。虽然师生关系始终有这一层,但在病房里凸显的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这与在语言里面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类似。这是我的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我整合词语间语义关系多重性理论、构式理论、语块(chunk)理论,提出“构式——语块”

句法分析法。那么这个我刚才讲了,我明天在交通大学会具体解释“构式-语块”分析是怎么回事。收获之三,我借鉴“元音和谐律”理论提出了“语义和谐律”。刚才我曾提到,“碗里有三条鱼”的问题,沈家煊先生用动词“有界”和“无界”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提出为什么动词是有界的后面的宾语就必须也是有界的。这就用语义和谐律去解释它。关于语义方面目前我就有这三方面的认识与收获,当然这个认识不一定对,这个收获也不一定对。

我认为作为研究生应该继续学习,增长知识,扩大视野,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独立研究的能力。过去我们常常提这种能力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发现问题。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研究生,要培养自己发现新问题的能力,这个很重要,连问题都发现不了你去分析什么,解决什么?我们北大,我不敢说所有专业,至少是汉语专业,不管是理论教研室,还是现代汉语教研室,我们从来不给研究生提出课题,你学了一段时间后让你自己提出了。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在语言实践的过程当中,发现什么,你可以跟导师商量你的看法,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但是问题都要你自己提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真要是你自己发现的问题想要去解决它,你就会兴趣十足,尽头十足。比如你们研究生,金老师给你们一个题目,你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你能做的好吗?做不好。现在就要培养怎样发现问题的能力。这里面有两方面,一个是看书、看论著。看论著一定要记住这三句话:论著的目的有三个,现在很多人只达到第一个目的,那就是这个论著讲了什么内容,这就完了。但不是说所有的书都要这样看,要精读的书,比如老师让你们念的哪些书或看的哪些文章除了知道这些论著里面讲了哪些内容,还要达到下面两个目的:一个是怎么样把论著的内容转化为自己头脑中的知识。一个人能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就在于他能不断的把别人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一个,那就是要学会怎样去发现问题,这儿讲的问题不都指的是毛病,这里既有相当于英语当中的question,也有相当于英语当中的problem,也有相当于英语当中的key,当然也有相当于毛病。要去发现问题,首先要有一个观念,不要认为写在书上的都是对的,不要认为老师讲课的内容都是对的。书上写的也好,老师讲的也好,说实在的,都是一种假设性的看法;老师你可以这样假设,书上你可以有这样的假设,但我也可以有另外的假设。当然你要是提出这样的假设你要有一定的根据,不能随便的去说。但是要有这个观念。那么如何去转化,如何去发现?就要在看的过程中勤于思考:作者为什么这样写?有没有另外的写法?这个假设的概括性怎么样?有没有例外?这是从书本,另外要从实践。实践就四个字:有心,用心。所谓有心,就是你既然吃语言学这一碗饭,那你对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要有心。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吕叔湘先生。我推荐你们看看吕先生的那本很薄的书,叫《语文常谈》。吕先生谈到的每篇就几百字,他就是谈看到的、碰到的一些特殊的東西。光有心还不行,还要用心,碰到一个问题要记下来,还要去思考。

研究选题与国家战略： 以二十国集团(G20)研究为例

朱杰进 上外国际关系与
副研究员 外交事务研究院

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件需要极大意志力的孤独而艰难的事情。唤起这种意志力的最好办法是选择一个能激发你热情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有研究热情的问题?怎样才能找到这样的问题?今天我想从我个人的研究经历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我想首先把我发言的结论告诉大家,让大家能很快明白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然后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研究选题的故事,算是对我观点的一个证明吧。我认为,有研究热情的选题往往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容易引起学术上的争论,二是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难题相关联。怎样才能找到有研究热情的选题?我认为两条路径很重要,一是要研读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史,主要是通过把握该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期刊中由知名学者撰写的review article;二是关注党和国家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和研究报告,纲领性文件如《十二五规划》,尤其是《十二五规划的辅导读本》(由部长等技术官僚撰写更具操作性),研究报告如昨天下午四点由世界银行、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我们了解现实世界中的难题和中国发展的困境,对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就要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寻找一个引起学术争论又与现实世界难题相关联的研究问题,方法是通过研读本学科最权威学术期刊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成是纵向维度),同时关注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和研究报告,对接和服务国家战略(可以看成是横向维度)。一般来讲,现实总是比理论发展的要快,横向维度的国家战略需求总是先于学术研究的理论发展,对我们来讲,关键是能找到两者的结合点。我的研究这要涉及二十国集团(G20)的制度设计,或者说是G20建章立制,具体来说就是G20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方案,是把G20打造成一个有很强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国际组织,还是把它建成一个只是在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协调政策和谋求共识的非正式机制。我倾向于后者,也就是G20维持它的非正式性。这里我要向非国际关系的同学和同事表达一个歉意,下面我讲的很多内容都与国际关系学科相关,这主要是由于我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偏好,不过,我还是希望对其他学科的同学也能有一点参考价值。下面我想具体谈谈我的这项研究,尤其我是怎样选择了这个研究问题。

研读权威期刊和学术史,寻找学术争论点和敏感点

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问题是,研究者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研究

定位在什么地方。一个学者要决定做什么样的研究,收集什么样的资料,写什么样的文章,向什么样的学术杂志上投稿,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和自己学术研究的定位相关。我们在做研究时要清楚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要达到什么样的学术目标。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研究,首先要清楚自己研究的目的和希望做的贡献是什么。这要求我们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工作、已有的文献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以前的研究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遗留下了什么问题,自己的研究和前人的学术问题是什么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把握各个研究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学术史,我们特别强调各项研究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在学术长河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怎样把握学术史和不同研究角色,一个好办法是研读权威期刊,寻找学术争论点和敏感点,也可以说是学术新增点,这种方法可谓“高端切入”,也就是把你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放在知识谱系和学术前沿的位置。

在国际关系学科,大家都知道,《国际组织》杂志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权威期刊,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制度研究方面,几乎上每一次新的理论突破和学术进展都是首先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用时髦的话讲,这个杂志能够设置学术议程,掌握学术话语权。而且这个杂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过一段时间,这个杂志就出版一个专刊(Special Issue),国内很多杂志最近几年很流行搞“主题文章”大概就是学这个的,专刊的意思就是这一期杂志,大概七八篇文章只讨论一个问题,第一篇文章,也就是导论部分,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把它问题一般化或者说是概念化,概念化后把变量操作化,建立因果关系的假设,这是通常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然后接下来五到六章都是案例分析,用不同的案例对第一章的理论进行检验,最后一章是结论,总结检验

的结果,并对下一步的研究做出展望,指出哪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种专刊对于我们研究选题的帮助特别大,客观地讲,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很多领域,与西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有些问题现在他们在探讨,要过上五到十年我们国内学术界才会探讨,国际制度研究西方八十年代热门,我们到了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大家一窝蜂地探讨。所以,关注权威学术期刊,看看别人在研究什么问题,尤其是西方的学术规范特别强调文献回顾和学术史,对我们研究选题有时会直接起到帮助作用。这里可能有人担心,这个问题别人已经研究过了,文章都已经发表了,我来研究还有意义吗?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一个是它是用英文写的,而你的研究圈子是中文世界,如我刚才所说,两者是有差距的,你在选题的时候,能够弥合这个差距,很多时候在国内学术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二是你的经验研究可以避开它,这与我要讲的第二点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崛起快速变革的中国,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做中国经验的研究,这样你就不会与西方文献雷同了。

我读博士的时候,为选题的事苦恼了很久。当时导师对我说,你都读博士了,一定要自己选题,说不定这就是你以后一辈子的主攻方向。我一下子不知道咋办了,只好每天待在图书馆,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既然你《国际组织》是最好的杂志,我要是选一个你上面的题目,总不会被开题和答辩的老师说这个题不值得做吧,毕竟我们还是要相信权威嘛,尤其是西方的学术杂志是有一套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保障的。当时我就找到了《国际组织》杂志的两个专刊,一个是2000年的《国际制度理性设计》,一个是2001年《世界政治的法律化》,《理性设计》的专刊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探讨国际制度的设计,具体来说,任何一个制度或者说组织,它的成员资格、议程设置、集中程度、决策方式、灵活性等方面都是由这

个制度所要解决的国家间合作难题决定的,包括执行问题、分配问题、权力不对称问题和不确定性问题等,制度设计的过程就是解决国家间合作难题的过程,这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新进展,从以前只是不断宣称国际制度是重要的,到现在开始研究如何去设计不同类型的国际制度。《法律化》的专刊实际上也是探讨国际制度设计的,为什么有的国际制度被设计成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变成了国际法律制度,如世界贸易组织,有些国际制度被设计成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大国之间政策协调的平台,如二十国集团。

当时我发现《国际组织》杂志的这两个专刊后,凭直觉我觉得这个研究问题很重要,一个在理论上很重要,毕竟国际制度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个时髦的话题,而这两个专刊又是由这个领域大家公认的一流学者联袂打造而成,二是在现实中很重要,毕竟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快速崛起,以前我们是竭尽全力加入国际制度(如WTO),做国际制度的遵守者和融入者,现在随着我们实力上升,我们当然要做国际制度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所以研究怎么设计国际制度肯定会摆上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议程,也就是成为我们的国家战略。这涉及到我们要谈的第二个方面了。

关注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和研究报告,对接国家战略

后来实践证明,我的这个选题运气很好,中国很快就参与设计国际制度了,不过当时我博士论文选的案例是联合国,形势的发展很快,再一次凭直觉,我选择了二十国集团(G20),因为我觉得联合国改革都已经喊了几十年了,看这个样子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大进展,而且联合国主要处理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中国已经是安理会五常之一了,也就是处在权力的顶峰,倒是国际经济领域,中国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实力,而话语权和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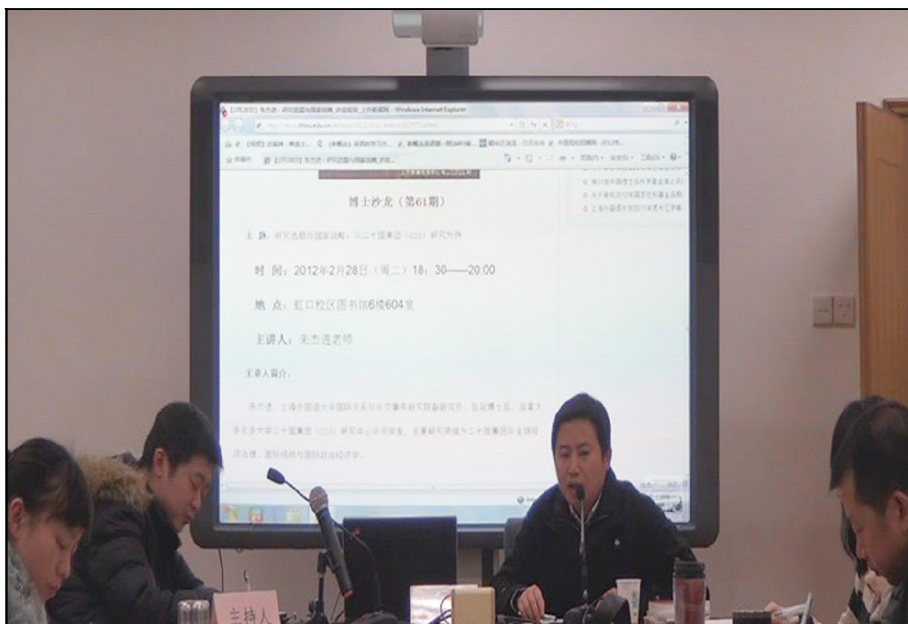
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欧洲、日本,也就是七国集团的手中,这一点必须打破。果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这个过程,中国人开始走向最核心的国际经济组织,开始设计国际制度了,林毅夫开始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上个周末在墨西哥召开的G20财长会议上,开始讨论今年六月份佐利克下台后,谁来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有小道消息说,中国人也有可能性),朱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在二十国集团中,有人说G20实际上是G2,也就是中美两家开始管理全球经济了,当然这可能有点过,但不管怎样,借助这场危机,G7变成了G20,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危机过去了呢?也就是在后危机时代,西方是不是会放弃G20,重新拾起G7,我觉得现在的关键就是G20自己能不能把机制建设好,让大家觉得G20就是G7要好,所以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战略目标,把G20的制度设计好。

在党和国家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中,我找到了相关的表述,进一步坚定了我的选题。《十二五规划》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关于外交部分谈到,要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尤其是杨洁篪外长在随后撰写的《十二五规划》辅导读本中,更是较为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推动二十国集团更好地体现代表性、平等性、实效性,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使议程设置、议事决策都能平等地反映各方意见和关切,力求做到民主协商、平等参与、互利共赢”。看了这段话后,更加坚定了我对G20制度设计研究选题的信心,毕竟十二五规划,顾名思义,就是我国未来五年的国家发展规划,在这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中,对G20的制度设计问题做了如此细致的表述,我想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2030年的中国》报告由1个主报告和5个专题报告构成,主报告是《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五个专题报告分别是:《未来二十年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追赶和创新实现增长》、《抓住绿色发展的机遇》、《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基本保障》和《与世界实现共赢》,谈到了中国如何参与二十国集团的制度建设。

结合我在博士期间研究国际制度设计的理论研究,我就开始把研究选题确定为二十国集团的制度设计,理论思考方面,我再一次拿起了国际组织的这两个专刊,思考它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思路,经验方面,我开始结合G20的具体材料,思考美国、欧盟等主要大国的政策选择以及我们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研读权威期刊和学术敏感点是一个方面,关注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是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的研究经历和选题过程,谢谢大家,也谢谢研究生部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图为第61期博士沙龙现场,朱杰进副研究员作客沙龙。



本期书目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葛兆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

·导语·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新世纪的大学需要培养新型人才,跨文化时代的民族复兴更亟待新一代学人拥有健全而强大的精神品格,具备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新型的知识结构。上外学人的使命,就是要养成这样一种主体:人格健全,志存高远;既有多元文化的开阔眼界,又有扎实丰沛的中外学识。这就需要上外学子,张开双臂拥抱广阔的大千世界,睁大眼睛注视博大的中外文化经典,开动脑筋鉴别和拷问种种思想学说,脚踏实地完成自我修炼和提升,在创造与奉献中实现人生理想。我想这也是校训“格高志远,学贯中外”和院训“研精思远,究微践行”的精神内核。

作为以外向型为特色的上外的学子,肩负着跨文化沟通者的使命。虽然我们的学科设置以“外”为重点,但“中”的立足点仍然是根本。上外学人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的角色,在身处或者面向异文化的时候,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但我们自问,对中国知道多少?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了解多深?事实上,生活在当代中国的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渊源和特点,以习焉不察者居多。当代中国如何从传统中走来?传统与我们有着怎样的联系?尤其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的百年文化转型中,中国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剧变?这些都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层面的要求,更是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新一代中国人,也是作为上外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取《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作为本栏目的开篇。作者葛兆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人文学者,对古代思想史有深厚积累和精湛研究。此书是作者在多年讲稿基础上的修订版,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即作为“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思想与文化历史。他在三卷本《中国思想史》序言中指出:“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第1卷第13页) 如果与另一位当代文史大家庞朴先生的同类著作《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 2008)相对照,这种特点就更加明显(庞著以“太一、杂多、阴阳、五行、象、玄、仁义、中庸”等概念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关键词展开论述)。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讲义》既包含了作者的学术立场、思想观点与研究方法,也饱含着对当代学子的殷殷期望。

文化学脉与血脉,需要一代代薪火相递;文化与文明的开拓,更期待青蓝更替与接力。作为新一代学人,我们如何在多元开放的文化时代,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创造?大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小到个人的修身养性,我们该怎样潜心而践行?其中,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的传统从何而来?所经何处?往何处去?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这本《讲义》就是十分精彩、有富于个性的中国古代文化指南。作者以“揣一张地图去古代中国旅行”作为自序之题,正凸显了该书的特点,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以此为导引,去领略中国文化浩瀚精深。

探究“个人化写作” 推动文化史传播

从《古代中国文化讲义》看弱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通常习惯以这样两种方式来看待历史的发展,其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其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而改变,此种方法指导下的历史事件常被写作者按照年表排列。其二,历史是由人的个体组成的,历史的进程终究是个人活动的集合,此种意识下的历史人物孤立地撑起了历史与文化的江山。不管是哪种方式,纪传体或是编年体,我们手边再也找不到“无韵之离骚”、“寓褒贬于叙事”,取而代之,最常見的文化史书写无异于书本上“大事件加精英人物”的叙述模式,似乎人物便是构成文化历史的点点珠玑,人物、断片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吗?

无疑,大事件加精英人物忽略了地理、气候、人民生活等的作用,也忽视了观念、习俗、宗教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影响。近年来,随着文化书写与历史重述的热潮涌现,这种精英主导、文化撷英式的写作方式已经渐渐淡化,文化与历史的多面性、复杂性、碎片性等特征逐渐被写作者发现并从各个角度加以采用,这也使得文化史的写作呈现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各为其所的样子。

《法国文化史》编者曾说:“一部文化史也许需要追问,一个群体居住的领土,一份共同回忆的遗产,一座可供共同分享的象征的和形象的宝库,一些相似的风俗,是怎样经由共同的教育,逐渐形成的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如何将中国文明传遍世界,而不是在外国人眼

中“文化民族主义的扩张”,便成为了一大难题,葛兆光先生在其《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一书当中,便隐约为我们呈现出来了这样一种令我们欲罢不能的“中国韵味”,这种韵味成为我们对“扩张说”的最好回答。

文化史当然可以展示社会场景,更可以铺排生活画卷,不过,它的最终的目的不应该是无所不包,而可以是将这些自行分散的文化、历史聚集贴近,从而弄明白古代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共同性的方法的形成。在这本书中,从古代中国观察世界的方式,到今天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了一脉相承,由此便能理解“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亘古之理了。

横向看来,我们不禁联想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文化史学思想——“从阁楼到地窖”,他们把历史学称作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强调从正统的上层的精英的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研究转向更普通的社会生活、环境、经济的研究。葛兆光教授的思想史研究有可能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呈现出一系列共同的目标宗旨,在我看来,这就牵涉到文化史“个人化写作”的最基础层面——科学认识“自我”。

民族文化走向世界,首先需要找到并把握文化的“自我”,而这个“自我”,在中国人看来,便是寻根,便是追寻古代中国文化的精义。试想,弱势民族国家一旦在文化上丢失了“自我”,它所谓的发展

只能是被强势文化殖民。我们谈论古代中国,就是为了激活我们自己的记忆与经验,反身体验一下自己周围环境、自己所处的社会,就是为了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现代中国是如何从历史上的那个古代中国转化而来的。例如,在本书第一章谈到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拿出一幅由传教士为中国人所画的世界地图,所见即所得,读者就能够站在当时中国人的角度,清晰地体会到古代中国人对“天下”的认知,这种认知甚至影响了从古至今的中国人对本国与中国的认识,因为它是“藉着对过去的发掘,让人们理解历史的传统和现代的位置”。

不能忽视的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既尊重客体、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又彰显主体、研究者的写作个性,主体与客体和谐共生的思想文化史写作方法,既要致力于追寻历史文化之“真”,尊重客体的客观性,也要注重文化的“人文特色”,我们也应看到,葛兆光教授在文化史书写中的“个性”:他着重在文化史书写中贯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致力于通过横向、纵向多层次对比促进本民族文化走出国门的调适与转换,使其顺应世界文明的潮流。

文化历史大潮滚滚,狂浪淘沙最终剩下的,也就是现代中国人所认为的文化精髓,就像谈及古代中国文化,必称儒释道一般,文化史的“个人化”终成并行于集体链条之外的又一道线索,闪光的思

想——或被归结为研究者用内化了的精神气质对历史的“解读”——终将赋予客观却又死气沉沉的古代文化以新的生机,这种思想使得文化“活”起来,穿越时空与读者近距离接触。单纯单调的文化叙述并不能推动受众的接纳,思想的传达才是造就经典的真材实料。在弱势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中,独具个人特色的“解释历史”比人为客观“还原历史”更可贵,这样的文化读解才能真正具有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古代中国文化讲义》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积极推进文化整合与传播的努力,无疑能够极大地促进弱势民族国家文化的动态发展和对外宏扬。

(张聪 上海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

·点评·

本文从葛著所体现的中外文化交往、融汇和生成的层面入手,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置于评价当中,由此“接着说”、“说开去”,从学术研究和论述的个性化,谈到文化史的传播,从古代中国观察世界的方式,到今天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立场和态度”,把当下中国所面临文化问题引入讨论,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的敏感和学以致用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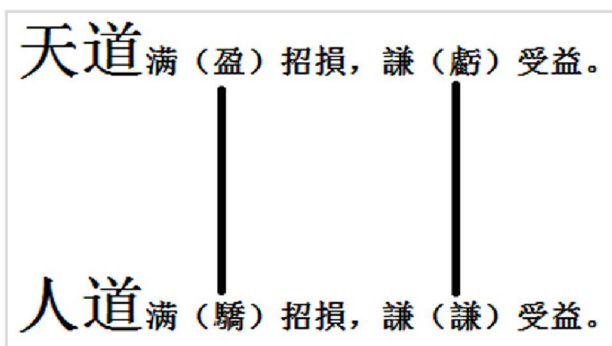
宋炳辉

由“天人之际” 看“满招损,谦受益”的释译

读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小识

“天人之际”是葛兆光先生《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中提到的一个“中国(汉)文化的侧面”。要讲“天人”,需先言“人人”。葛先生是书曾提到中国文化的另一侧面——家族与亲情。尽管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然而它的支脉却延展甚广。三代以后中国(汉)人的伦理观,基本就建立在了这个框架以下。《礼记·祭统》就已提出“十伦”。然而,等级和次序森严的前提却是一个字——亲。《孟子·滕文公上》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是也。

对于骨肉至亲,先人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礼仪来“有叙”。相反,对于遥不可及的“天”,我们却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我们发现,这种“合”也有一个前提——际。际的本义是墙壁的接缝。抽象来说,这是一种介于绝对分离与绝对连接之



间的零界状态。天人之际,既是难越的鸿沟,又是相交的溪流,天、人对立并统一着。由此引发出笔者对古语“满招损,谦受益”的再思考,传统对这句话所训释的“自满招损,谦虚受益”恐怕有待商榷。我们认为,“满”就是“多”,“谦”就是“少”,整句话的

意思是“满盈受削减,不足得补充”。下文试论之。

“满招损,谦受益”语出《尚书·大禹谟》,是伯益劝谏大禹修文德使苗民顺服之言。联系后文,“满招损,谦受益”下另有四字——时乃天道。诚然,先人重“道”,所谓“天道”,更是统领宇

宙万物的根本性规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适性。因此,如果仅将“满”释作“自满”,“谦”释作“谦虚”,恐怕不能称作天道,充其量只能算人道。《庄子·在宥》就说:“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易·谦卦·彖》:“天道亏盈而益谦”,《周易集解》引崔憬言:“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彖》又有所谓“人道恶盈而好谦”,《周易集解》亦引崔憬说:“满招损,谦受益,人之道也。”本相类同的两句话,为何就有了“天人之际”?崔憬注解又何以易《尚书》原文的“时乃天道”为“人之道也”?我们认为,这正是“天人合一”观的渗透。天道与人道的分别虽不可不察,然天、人并非泾渭分明的。《礼记·中庸》:“诚者,天之道也;

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评《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引言·

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庞德(1954:91)曾经说过：“传统是一种我们要保存的美而不是一套来束缚我们的镣铐。”从五四时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解构，到当今社会的“国学热”、“于丹讲论语”等等，古代中国文化在人们的视野中经历了太多起落沉浮，而今，人们更加心平气和地挖掘关于古代中国的那段记忆，保存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美。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正是这样一本书，沉寂已久的历史，在读者眼前慢慢清晰，婚丧嫁娶、四时八节、庙会法等各种文化习俗跃然纸上，作者娓娓道来，不同于传统的文史类理论阐释，亲切自然的讲话和随笔文风，毫无枯燥之感，道出的却是厚重的古代文化积淀，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文聚落，带领读者穿越上下五千年的时空隧道，引发无限想象与思考。

按图索骥 开放式的互文体验

古代中国文化是个很抽象的话题，如何通过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更是一件难事，葛兆光先生以一种绝妙的方法，就是让读者揣一张地图去古代中国旅行，更注重读者自己的阅读体验和体悟，与古人亲近交流，阐发属于自己的思考与感受，找寻那个叫做“传统”的世界。这样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不会凸显某些传统或是遮蔽某些历史，而是让读者们亲自感受古代文化的种种奇妙，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

这样的开放式互文体验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提倡的，接受美学、阐释学等文论都注重读者的主观体验和再阐释，原本的意义在读者的不同视野中得到丰富和增益，现象学大师胡塞尔(2001:283)曾言：“陈述外部事物的句子之意义并不存在于这些事物之中，而在于我们内心对这些事物的判断中。”该书正体现了这样一种现代理念，不同于传统的理论阐述，本书不求统一性真理或结论，而是凸显思想的差异性，注重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作者认为一堆历史文献并不足以使得读者了解历史，而是需要读者发挥文学家的想象力来理解古代，在文物环绕中想象古代的生活场景，从而建构出文字背后的历史。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是葛兆光先生若干年来在日本、香港和大陆各大学讲课的课堂记录，在谋篇布局及语言运用方面可谓用心良苦。为了使其更容易被读者接受，该书采用半是讲话半是随笔的形式写成。作者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融学术性、知识性为一体，论述过程中旁征博引，运用了大量珍贵材料，笔风亲切自然，引用信手拈来。如讲到传统家庭关系和礼仪时，巧妙地以《红楼梦》这样一部人尽皆知的经典为例，将复杂的血缘及人伦关系讲得绘声绘色，极具可读性。尽管该书在文化史的把握上不像其他理论书籍那么系统，但具有更强的趣味性，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谈古代文化。较之一桌饕餮盛宴，该书更像是饭后的一道甜点，让读者在从容闲适间细细品味。

以小见大 从礼仪与宗教管窥 古代文化

作者深刻地意识到，枯燥的文化阐释和抽象的哲学理论过多，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况且，传统的文化并不等于中国哲学史，只谈孔孟之道、老庄之学并不能涵盖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事实上，古代人们的生活中还有诸多方面涉及到文化与传统，各种礼节、各类服饰、各种信仰，皆是学问、皆有内涵。古代中国文化所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想用薄薄的一本书将其说清楚实属不易。

“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梁漱溟:43)。”而这尊卑概念的外显形式就是种种繁复的礼仪和仪式，那些三亲六戚、行礼作揖、婚丧嫁娶的旧时习俗，却支持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伦理和秩序。因此作者没有从抽象的伦理和政治写起，而是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礼仪风俗着眼，对礼仪的尊重依托

着古代人对伦理和秩序的自觉，本书以小见大，管窥古代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作者从“礼”中提炼出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价值观，分析几千年来奉行的“孝悌之义”与“仁爱为本”。

其次，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古代中国的宗教发展，从佛教的东传，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从老庄哲学的无为与清高，到道教的种种仪式与法术，作者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历史画卷，描述了佛教与道教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使得读者从中体悟出佛教的转世轮回、禅宗的无念无相无住、道教的阴阳相和修炼永生。各路神仙遵循不同的等级秩序，各种信仰秉承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本书从小处入手，从细节着眼，化抽象为具体，使读者能够轻松地理解那段尘封已久的古代记忆。

观古历今 传统与现代的美妙融合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代渐渐离我们远去，古代的那个中国文化世界，现在想想也只是一些记忆。那么，如何在记忆中重新理解古代中国的传统和文化？该书并没有泾渭分明的把“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分开，作者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庞大体系中抽绎出了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点，联系现代生活的现象，然后层层展开。尽管是在谈古代文化，但总感觉与我们现代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正是本书特色所在。当我们读完一章时，不仅能够把握古代中国文化的某个现象，同时也和我

们的现代生活加以联系，有时这一知识点也会纠正我们对某一现象的错误认识。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说：“我们谈论古代中国，就是为了理解现代中国，换句话说，就是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现代中国，是怎样从历史上的那个古代中国来的。我们要追问，到底现代中国有哪些地方已经和古代中国断裂了，哪些地方又还在和古代中国藕断丝连？到底哪些方面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所笼罩，哪些方面我们还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到底那些古代的影子还支持着现代人的心灵，那些古代的文化已经被现代的文明摧毁了？”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的：“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人需要在现代化的洪流中继续继承和发扬传统哲学和文化，努力促使古老文明与现代社会的交融共荣。

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言，做学问“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本书虽阐述的是几千年的历史记忆，却没有一般理论性阐述那样“自闭”或者“孤芳自赏”，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对过去的挖掘是让人们理解历史的传统和现在的位置，若是作为专门的知识，锁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成了试管里永远不进入临床的药物，怎会有生机？观古而知今，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这是本书的高明之处，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发展的必由之路。

·小结·

当今社会，处处是各种诱惑与挑战，人也很容易变得浮躁不安，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躁动的社会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境，静下心来阅读几本好书，这对更好的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很重要。佛家常言人人皆有佛性，葛先生也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都储存着传统文化的记忆和经验，都会有见理见性的解悟之途。这本书给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开启了一场新的时空之旅，读者可以静下心来在“自助旅行”中体悟沉潜，管窥古代生活的画卷，领略古代中国文化的美，更好地去构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认同。(彭文青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级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葛兆光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北京:商务印书局,1999

王国维

人间词话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Pou nd, Ezra.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54
Husserl, Edmund. *The Shorter Log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点评·

这是一篇很好的图书评论。文章既能很好地概括书中所论，还能从一个读者的角度，领略作者的论述方式与特点，更能体会著作者在文字背后的用心。我们呢，也可以从这篇文章中见出作者的学养和性情。宋炳辉

<<< 上接7版

诚之者，人之道也。”两者有体(天)、用(人)之别。我们可以藉此描绘出一个天道与人道的上下位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同样的语词，在“天道”和“人道”不同文本背景之间，可以做两种不同的阐释，反应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经典训诂及语言释义中的贯彻。

若依崔憬的“人之道也”，那么传统对于“满招损，谦受益”的释译是没有问题的。但《大禹谟》原文既是“时乃天道”，我们就要重新审视其内涵了。在这个文本下，“满招损，谦受益”当译为“满盈受削减，不足得补充”更为合理。即《道德经》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

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此义理的推阐亦有若干考据、辞章的佐证。

●从“谦”得声的字，具有“少”的意思，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谦》中提出：“愚以兼声类诸字求之，谦盖谓言之不自足者也。知者：兼声之字多含薄小不足之义。”详杨书。

●黄锡全《汗简注释·卷一》指出：“谦，《大禹谟》谦字一见，薛本作谦，内藤本作，此同。”除薛本和内藤本外，“谦”与“嗛”之异文在敦煌本《尚书》和《书古文训·经文》中同样存在。王力《同源字典》指出，

“歉”、“嗛”为同源字，皆可训“少、不足”。而“谦”、“嗛”又通用。它们在“谦(嗛)受益”中仅可释作“少”，不可训为“谦虚”。

●古人所说的“自满”、“自谦”，非今人之谓“骄傲”和“谦虚”。《后汉书·舆服志上》：“幡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后谦一寸”就是向后缩进一寸，以显示“不敢自满也”。“自满”在此表示“自认为多、大”，到后世才引申为“骄傲自满”义。

●《文心雕龙·丽辞》篇：“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既是对偶，“损”、“益”，“满”、“谦”皆得两两相衬。古书中“损益”

连用，分释“减少”和“增加”，如《易·损卦》：“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礼记·三年问》：“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则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道德经》：“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可见“损”、“益”，就是“减少”和“增加”的意思，而不是后人所谓“损害”和“得益”。

综合看来，将“满招损，谦受益”改释为“满盈受削减，不足得补充”，既有训诂学上的证据，又体现“天人之际”观对汉人思维的深刻影响，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这句成语的内涵。

正如葛先生在是书大陆版后记中提到的“古层”和“低音”。体味中华文化，须“于无声处闻惊雷”。拙文

亦尝试从一个小成语的训释，来参透“天人合一”的大道，期有所得！（陈健 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点评·

从小处着手，以抵达中国文化的大景观，是本文总体思路和行文特点。作者以训诂方法入手，又引多种典籍相参证，在对一个古成语阐释的修正和完善中，体会“天人合一”的精神，既有逻辑性和说服力，也体现了作者比较扎实的文史修养和语言功底。宋炳辉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推荐书目选摘

[德]梅尼克:

《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第71期沙龙主讲人孟钟捷副教授推荐

在二十世纪的那场浩劫中,德国人民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他们亲身参加,亲眼目睹了这场疯狂,又怎能不对国家和民族产生怀疑,又怎能不对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家园可以重建,伤口如何愈合。于是就有了《德国的浩劫》,目睹了一个世纪德意志历史的老人,在用他的暮年之作,用他艰难反思的结果,抚平一代人心中的伤口。

梅尼克很坚定的告诉我们,希特勒和军国主义的兴起,不是热爱自由的德国民族性格的逻辑结果。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浪潮的碰撞,马基雅维利理论的毒害,工业化运动中人性的扭曲,汇集在当时的德国,才产生了时代的“畸形儿”。历史的种种机缘巧合,把这个以理性严谨著称的国家拖入了一个狂热的漩涡。

这位老人不无惋惜地回想当初,歌德时代的完美,俾斯麦第二帝国的古典传统。狂热散去,这些积淀下来的品格终会经受住考验。今天的德国没有让他失望。这位老人向我们展现的一个健康国家知识分子的底线——尊严和反思,也让我们充满希望。

陈平原: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假如没有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第72期沙龙董乃斌教授推荐

该如何在大学课堂中教授文学,依靠着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文体敏感、作为史家的逸事解读能力,作为文学史教育的独特体会,陈平原教授通过《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给了我们一个新鲜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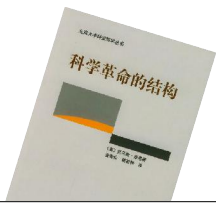
在本书之前,教授已经为文学教育改革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可以说是长期实践的结晶。从追溯“文学课堂”开始,作者表达了对兼重“历史演变”和“艺术分析”方法的缅怀,提倡打破已经固化的教学形式。他提醒我们,除去传统教育的思路,还可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本书亲身实践,通过对大量原始史料的钩稽和对若干细节的精心选择,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现场的生动面貌——黄人的辞典编纂,鲁迅的文学史书写,作者以史家“分寸感”发觉逸事背后的精神,发明宗旨,考镜源流。

而作者另一本《假如没有文学史》,则是文学史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硕果,甚至可以说这本学术随笔集开启了重写文学史的征程。

今天的文学教育,是否能达到前辈们呕心沥血期期望的愿景,我们拭目以待。愿历史的脉脉温情,驱散今天书斋中所有的寒冷苦厄。

[美]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第59期沙龙朱磊博士推荐

“范式一改变,这世界也就随之改变了。”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托马斯·库恩发出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试图将被误读的科学和科学史还原本来面目。他提出的“范式转变”这一概念,潜移默化地成为了建构人类知识重要的一环,也让他从物理学家转变为思想家。

与任何革命一样,当科学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感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时,科学革命就会兴起,这是科学进步最重要的方式。科学是在否定的前提下前进的,库恩围绕这个论点,分析了科学革命的方方面面,包括:常规科学的本质是解谜、范式的优先性、反常与科学发现的实现、危机与科学理论的实现、科学革命的本质与必然性、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通过革命而进步。

五十年前,这本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书出版了,它成了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多的科学书籍。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库恩醒悟过来,彻底颠覆了世界看待科学的方式。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们,这本书有着耐人寻味的意义——人文科学发展到今天,著作汗牛充栋,却还是没有摆脱“科学之名”的纷争。在库恩看来,正是缺乏一种公认范式的缘故。

[英]帕特里克·邓利维:

《博士论文写作技巧——博士论文的计划、起草、写作和完成》,赵欣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78期沙龙王圆圆博士推荐

每篇博士论文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确实是在用一种最规范的文本来“不断找回(智力遗产中)曾经失去的部分、恢复曾被忽视的部分、汇总曾经分散的部分、修复曾被破坏的部分、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重新组织,使知识更易理解、重新发布并重新投入”。在任何领域撰写博士论文,一些写作技巧都是通用的,这些技巧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过去20年间,对研究技能的培训已经进一步正式化,但是相比之下,这些“手工艺”式的写作技巧却被忽视,并且未能系统化。从最初的构思阶段到成功地完成论文,这本书都提供了系统全面的方法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帕特里克·邓利维教授并非要用这些建议和技巧来限制个人的原则和研究需要;相反,他希望通过本书帮助博士生们拓展思路,接受各种创作挑战。

上外博士沙龙主讲人最新学术成果目录选摘

·文学·

主讲人	题名	文献来源	期数
虞建华	巴塞姆兄弟的文字绘画与后现代美国肖像	当代外国文学	2012-04期
	极简主义	外国文学	2012-04期
	文学市场化与作为心理自传的《马丁·伊登》	外国文学评论	2011-04期

主讲人	题名	文献来源	期数
宋炳辉 (第60期主讲人)	陈谦小说的叙事特点与想象力量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08期
	论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文艺理论研究	2012-03期
	贾植芳先生的人格精神及其学术贡献——以其翻译实践为重点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2期
	作为文学关系研究范畴的“世界性因素”	中国比较文学	2012-02期
	陈众议的学术视野与文化关怀	当代作家评论	2012-01期
	只要能用得上的,我都不拒绝——王蒙访谈	扬子江评论	2011-04期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比较文学	2011-03期
	王蒙的翻译活动及其语言才华	扬子江评论	2011-02期

·语言学·

作者	题名	文献来源	期数
史文磊 (第68期主讲人)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研究综观	当代语言学	2012-01期
	国外学界对词化类型学的讨论述略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02期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转移	中国语文	2011-03期
	《运动事件:跨语言词化模式考察》评介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06期

主讲人	题名	文献来源	期数
吴美芸 (第66期主讲人)	论基于记忆资源的依存局域理论及潜在问题——来自汉语关系从句的挑战	当代语言学	2012-04期
	《核心词后置结构的加工与生成》介绍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01期
	基于经验还是基于工作记忆?——来自汉语新闻语料库中关系从句生命度格局的证据	语言科学	2011-04期
	试论量名不匹配构式在语料库中的低频出现率及内在原因	现代外语	2011-02期
	试论Hawkins的领域最小化理论于汉语关系从句加工之意义及潜在问题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01期

·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

主讲人	题名	文献来源	期数
刘宏松 (第77期主讲人)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否成功的三大标志(与黄仁伟合作)	国际观察	2012-05期
	中国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倡议行为探析	国际观察	2012-03期
	中国对WTO规则的遵守:一项综合评估	教学与研究	2011-11期

主讲人	题名	文献来源	期数
吴瑛 (第51期主讲人)	中小学生学习网络接触与使用:上海例证	重庆社会科学	2012-08期
	中美软实力在G20峰会中的比较研究——从国际媒体引用的视角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2-03期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对5国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	浙江社会科学	2012-04期
	西方媒体是诠释共同体?——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被引用为例	国际新闻界	2011-07期
	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3期
	全球媒体中的世博会舆情分析(与郭可合作)	新闻大学	2011-01期
	中国文化在泰国的影响力研究(与冯忠芳合作)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1期
	中国话语的议程设置效果研究——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02期